

我的教育人生

学习是学生主动求知的结果,而不是用“营养液”浇灌出来的,学校和教师要做的,就是给学生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。学生学习犹如“游泳”,教师适时提醒他们水深水浅把好方向即可。

葛墨林:学习不能靠“营养液”浇灌

□本报记者 吴绍芬

“别拿‘长江’‘杰青’当封号。”前几年,因为“犀利”的言论,中国科学院院士、南开大学教授葛墨林一度有点“火”。尽管语出惊人、观点辛辣,但私下里,这位著作等身的院士却是幽默低调、可亲可敬的长者,他不仅在高等教育领域建树很广,还对基础教育有浓厚的兴趣。在一些学校做讲座时,他直言不讳:“学生学习的主动权在自己,教师只是帮助学生、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。对于现在中小学教育中的灌输式教育,我提出反对。”

为什么这么反对灌输式教育,为什么屡屡“直言”?日前,记者走近葛墨林,听他讲述自己的教育观。

求学到兰大,只为“向科学进军”

1956年,葛墨林从北京十三中(原辅仁男中)高中毕业,一心想学核物理的他特别想报清华的核物理系。没想到,一夜之间他却改了主意。

想起当时的情景,葛墨林仍历历在目。“学校老师找到我,说国家计划要加强兰州大学核物理系的力量,想从北京、上海等地选派一批优秀学生报考,以壮大国防事业,为国家储备人才。我积极响应号召,二话没说就报考了。”

可是,到了兰州大学,葛墨林却受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打击。怀着报国之志欢天喜地来到学校,迎来的却不是自己钟爱的核物理专业。“事后多年才知道,我的档案里被放错了材料,说有亲属在境外。这样的学生怎能够格学校技术呢?”葛墨林当时未免有些失落。

既来之,则安之。从北京到了兰州,葛墨林静下心来学习。在他的记忆中,虽然专业是理论物理,上课地点非常偏僻,晚上时还有狼出没,但在导师的严格教育下,他还是学得比较顺利。

但如许多同龄人一样,葛墨林求学时也经历了一段下放劳动的岁月:白天挑土挖地,掏化粪池,烧锅炉。印象最深的是当年自己的老师段一士在前面拉车,葛墨林就在后面推,学校里最团结的一对师徒就这么出现了。

尽管遇到了许多的困难甚至是不公的待遇,但葛墨林内心练就了坚忍的性格,而且有一种对学问的执着支撑着他。即使是在几十年后的今天,葛墨林还是深有感触地说:“我们常常白天劳动,晚上用窗帘把窗户挡起来,躲在房间里偷偷地做研究。做理论物理的不接触外边的资料不行,但搞得不好又怕被扣帽子。”

“面对生活的压力,有些人会选择放弃。

您为什么还如此钟情于学问?”记者忍不住问道。

葛墨林坦然一笑:“无论在哪里,无论是什么样的条件,做科研的不能离开自己的研究。只有回到自己所喜欢的领域,才有一股内心的宁静。我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做学问,直到现在,晚上一点两睡,早上六七点起床都是常事。”

虽然那段日子很苦,但葛墨林至今仍存感激之情。他说:“兰大的学生有一股子劲儿,不浮躁,不与世相争,都是靠自己的努力去做。做到什么程度都觉得知足,老老实实,不浮夸、不急躁,沉得住气。”在葛墨林身上,我们能够看到他这样的风格和“兰州品”。

相遇大师,求得学问寻真经

如果说,兰大的学风为葛墨林培养了脚踏实地、做事沉稳的好品格,那么,与杨振宁、陈省身大师的相遇,则为他后来当老师、做学问奠定了好的基础。

“我这一生与其他同龄人相比,幸运得多。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无法遇到一个好老师,而我在上学期间就遇到了段一士,后来又幸运地遇到了杨振宁,还能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做研究、推荐我到陈省身数学研究所工作,真是幸之又幸。”谈到这些,葛墨林眼里泛出幸福的泪花。

回忆起与杨振宁的交往,葛墨林非常兴奋:“是他教会我从事科研要时刻站在学科前沿,对学科领域要有一种洞察力、敏感度。”葛墨林还记得第一次见到杨振宁的情景。那是1972年,听说杨振宁要在北京做演讲,葛墨林兴奋不已,连夜从兰州往北京赶。这次演讲,葛墨林被这位睿智而机敏的科学家折服了。而促成葛墨林与杨振宁相见的,是他与导师合作的一篇文章引起了杨振宁的关注,为此,杨振宁专程来到兰州大学。正是这样的机缘,1980年葛墨林接受杨振宁的邀请到美国的研究所做研究。从此,一扇更为广阔的学术之门向葛墨林开启。

谈及对杨振宁的印象,葛墨林脱口而出:“眼光独到,创新性强,令我佩服。”

跟着杨振宁做研究,葛墨林坦言很辛苦:“他更多关注的是做什么,然后才是怎么做。”这对对学生来说,就要求必须具备扎实的理论和功底和悟性,尤其是对学科前沿的敏感度。葛墨林永远记得,在杨振宁美国的家中有个大抽屉,里边有不少用夹子夹起来的大纸片,经常有学生到家里来向他提出问题。每每这时,杨振宁都会把那些夹子拎出来,对症下药拿出手算稿与学生研讨。如果学生不找他,杨振宁也不会过于主动地与学生沟通问题的解决办法。



葛墨林,物理学家,中国科学院院士。1938年生于北京,现任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所教授、博士生导师,教育部科技委副主任。致力于杨振宁·巴克斯特方程等理论物理研究,在国际上具有较大影响。

“或许,这就是大师的独到之处吧。”葛墨林笑着说。

而今,葛墨林乐意把自己从别处受益的东西全部传递给学生。有不少学生问葛墨林科研成功的秘诀,他一般会给出三点建议:一是兴趣形成勤奋,只有对一件事感兴趣,才会勤奋地去学习、去研究。二是要不断提高悟性,勤奋并不代表一个人能把这件事情做好,悟性才是最重要的,而悟性就是要不断地发现问题、提出问题,并有深入思考的能力。三是机遇。小事不计较,转折点一定要选好。

葛墨林在南开大学培养了一批研究生,他们现在活跃于中国物理学界。责任感强,工作勤奋,学风严谨,是人们对“葛门学子”的印象。

如今,面对教学科研中一些“工业化生产”“批量化模式”的弊端,葛墨林十分痛心。他敢于直言,希望正人先正己:“我坚持自己培养研究生的方式,培养他们的个

性,以及对科学的敏感度。我的学生不搞‘流水线生产’,一定是基于自己的兴趣,就像在游泳池里,让他们随着灵感去游才能学会游泳。教师所起的作用,就是适时提醒他们水深水浅,帮他们把好方向!”

学生是学出来的,不是教出来的

1985年,陈省身在南开大学创办了数学研究所。在杨振宁的力荐下,葛墨林进入南开大学工作。

而与陈省身的一次聊天,让葛墨林终身难忘。

那是一次聊人才培养,正当葛墨林说得起劲儿时,陈省身打断他说:“墨林,我觉得‘培养’这个提法不妥,有点像培养干部。你以为学生是根苗,想把他弄成什么就是什么?为什么要给学生考虑得那么细呢?”当葛墨林听得云里雾里时,陈省身点

拨道:“每个学生都有个性,如果一味地强迫学生这样做,那样做,效果反倒不好。我觉得学生是学出来的,好学生不用教,差学生教也没用。”

葛墨林幡然醒悟,学习是学生主动求知的结果,而不是用“营养液”浇灌出来的,学校和教师要做的,就是给学生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,让他们在一个大的框架里自由发挥。

“主动性最重要,一个人如果是被强迫学习,那么学习的效果也不会太好。”葛墨林说。他始终相信,作为学生,首先要明白学习乃自己分内之事,教师的作用是适时点拨,不让他们走太多弯路。

葛墨林在培养年轻人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,有些学生已经成为国内外有影响的领军人物。

“您是如何促进学生学习的?”在许多场合,葛墨林被问到这个话题。

葛墨林说,我反复告诫学子们:“要多提问,然后一步一步追问下去,一定要有问题的意识。”每堂课讲完,做完实验,葛墨林都要求学生能提出问题。“通过提问养成习惯:不是讲故事,而是要很简短地提问。”葛墨林坦言,大学生在学习的初始阶段可能提出的问题很幼稚,这不要紧,慢慢地形成习惯后,就能提出高水平的问题了。

葛墨林还表示,不仅要学会提问,而且还要学会正确对待别人的不同意见。“多数人提问是善意的,作为研究者,要善于从批评意见中学习东西。多了一个老师,何乐而不为呢?”

发现问题不容易,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更不易。比这些更可贵的是,葛墨林还敢于将这些问题和办法在大众场合说出来。“只要有益于研究,有益于人才培养,我不怕得罪人,不迷信权威。”葛墨林扶了一下黑框眼镜,笑着说道。

这个血液里有着大西北味道的院士,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种责任感、正义感,才敢于在各种场合发表犀利的真知灼见。针对长期以来科研评价体系过于单一、评价活动过于频繁、唯论文文化、唯SCI指标的倾向,他也敢于抨击:“这个时代该终结了。评价体系既要重基础研究更要重成果应用,科学研究既要基于兴趣看重个人自由探索,也要切中国家需求进行协同创新。”

在别人看来,物理艰涩难懂,但葛墨林却一直强调:“物理是有血有肉的学科,决不能教成‘八股文’。一定要把各个知识点的‘隔板’拆开并去掉,发现学科知识带给科技、生活的魅力。”

干了一辈子物理,这位老人直言自己就是喜欢,愿意为之奋斗,而他对他辈的期望是:“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路径是最重要的。有了兴趣,再多的困难都会想出办法解决。”

名家专栏

教育活动的美,不在奢华,而在朴素。美体现在是否尊重了孩子的天性、人性、灵性,体现在是否引导了孩子的习惯、情商、思维等核心素养,绝不在于节目有多精彩,活动有多高规格的领导参加。

教育活动,朴素才是美

□陈钱林

每所学校都会举办教育活动,诸如艺术节、体育节、开学典礼、毕业典礼等,这些都是学校教育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但是,这其中许多很有意义的活动却偏离了轨道。

过于讲究形式。如学校体育节的开幕式,许多学校都组织了极其丰富的入场式,节目一个比一个精彩。这对参与其中的孩子而言,可能是很难忘的一天。问题是,节目的背后到底花了师生多少时间?曾有学校在开完运动会后,有教师在微信朋友圈里吐槽:“3个月来没有好好睡过觉。”这说起来或许有点夸张,但不可否认,为了体育节开幕式的瞬间,全校师生付出了大量心血。师生的时间本身也是资源,资源都有一个恒量,这里投入多了,就意味着别的地方投入少了。有时候我们想想,一个运动会,为什么要花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准备呢?

过于提倡竞争。如学校举办艺术节,每个班出节目,为了获取奖牌,许多时候家长也介入其中,请家教、做服装,动不动就花许多钱。我曾经听说,某学校为了让集体舞蹈节目获奖,不惜花十几万重金请省内名师量身打造。如科技节活动,小发明、小制作比赛作品一个比一个技术含量高,有个公开的秘密是,这些获奖的作品是孩子做不出来的,其背后实际上是家长实力的比拼。

迎合领导。令我们司空见惯的是,举办

大型活动时学生集中在大操场,台上领导一片,忙着致辞、发表讲话。学生可并不喜欢,打打闹闹不断。曾有媒体报道,某校在大操场请领导做重要讲话,全校学生在烈日下站了半个小时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问题?这或许与社会文化渊源有关。长期以来,我国社会官本位意识、竞争文化盛行,学校做活动喜欢讲排场,比较在意邀请何方领导出场。

这样的活动,有效果吗?有意义吗?在我看来,从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出发,办活动应有这样一些理念:

教育活动要以生为本,“学生第一”。“生本”,不只是以学生群体为本,而是要关注每一个学生个体。组织教育活动,往往最先受益的是特长生。让特长生展示技能未尝不可,但关爱全体更重要。面向全体,是教育的基本原则。我先后在三所学校任校长,特别强调教育活动应全员参与。有一次,学校组织朗诵活动,分段集中演出。我在路上遇到一个孩子,家长说孩子有心理障碍,最好不让他参加这次活动,怕上台紧张。我说服家长要利用这次机会让孩子接受锻炼,尽管表演当天孩子很紧张,影响到节目的精彩,但我很高兴。因为,这个孩子能上台,我们也收获了另一个精彩。

教育活动要课程化,克服运动式倾向。比如,我们学校传统的读书节、科技节、体育节、艺术节的基础上,增加了数学节、

英语节、演讲节等,整合成系列化活动课程。以往,学校的文化节都要等教育局发文,主要工作无非是选拔特长生参加教育局组织的比赛。整合成校园文化节活动课程后,学校每月固定一个主题,避免了行政化倾向;倡导普惠理念,所有学生都要参与活动,避免了以选拔比赛代替全员活动的功利性。

组织教育活动要有资源意识,以朴素理念办教育。我在温州建设小学任总校长时,提出“朴素办教育”的理念。如艺术节,要变节目演出为节目展示,班级之间不排名,提倡孩子们出节目时只穿校服不化妆。如校园文化节,全部流程由学生完成,连宣布开幕的任务也由学生承担。从节目的形式上看,好像质量降低了许多,但丝毫没有影响孩子们参与的热情。这种改革受到教师的广泛好评,主要是节约了教师的精力,特别是明显缓解了班主任的压力。

我觉得,追求教育活动的节目和形式的精彩,是不良风气。且看那朋友圈晒出的一台台精彩的童子戏,仿佛有艺不压人誓不罢休的态势。实际上,朴素的东西才是最美的。教育活动的美,美在是否尊重了孩子的天性、人性、灵性,美在是否引导了孩子的习惯、情商、思维等核心素养,绝不在节目有多精彩,活动有什么级别的领导参加。

(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学校校长)

观点

好的教育是好的师生关系

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翟小宁在2015年全国基础教育发展论坛上发言指出,好的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好的师生关系。这个关系是教育特别重要的要素。马克思说,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。教育也是这样。用任何一种方式疏远了、隔离了人与人的交流,这与教育是相悖的。

“互联网+”教育时代,我们要坚守的是什么?一方面要适应“互联网+”时代的发展,要引领这个潮流发展,要与时俱进,同时要回归教育本质,不断追寻教育的本质。教师是什么?教师是学生学习的榜样,教师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者,教师要尊重互联网发展的规律,尊重教育规律的规律,尊重学习的规律,尊重学校管理的规律。互联网提供了大量的信息,而教师是让学生学习的现实教材。爱、关心、气质和人格魅力等等,可以替代千言万语,甚至一个眼神都很重要。

整齐不是唯一答案

刘阳在《人民日报》撰文,一个民族的语言、文学和文学中,蕴藏的不仅是作为技巧的语言文字本身,而且是一个民族血脉中内在的文化精神密码。

所以,教育绝不应只是识字造句、背诵默写,应该追求的是培养学生通过语言文字进入本民族文化精神的途径,从而发现民族文化和精神的内在魅力,以此养成健康的人格,并激发出活跃的创造性和批判性。所以,教育不能囿于课堂上学科本身,更是关于民族人才培养持续的学问,必须允许学生有不同标准的答案。